



清史译丛



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十一辑

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



NLIC297093709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清史译丛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十一辑

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NLIC297093709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译丛. 第11辑 / 董建中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8967-8

I. ①清… II. ①董… III. ①中国历史—
研究—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278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清史译丛

第十一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967-8

2013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 35.00元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清史译丛》编委会

主 编：于 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刘 东 朱政惠 张西平

[英] 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执行编辑：徐思彦 王大庆 戴 寅 叶柏川 辛向媛

序 言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既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完成新世纪我国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切实保证。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临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如何认识和体现出“世界眼光”，即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之一，为此，我们需要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做到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论点摘编”、“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1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001

董建中

整体史：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 / 004

[美] 傅礼初 著 董建中 译

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 / 037

[英] 阿谢德 著 唐博 译 董建中 译校

中国与17世纪危机 / 053

[美] 魏斐德 著 唐博 译 董建中 译校

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 / 078

[美] 艾维四 著 董建中 译

康熙萧条与清代前期的地方市场 / 105

[日] 岸本美绪 著 沈欣 译 董建中 译校

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 / 125

[美] 万志英 著 王敬雅 译 董建中 译校

1635—1644年前后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 / 155

[美] 艾维四 著 袁飞 译 董建中 译校

17世纪的东方与西方

——斯图亚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明代中国的政治危机 / 180

[美] 金世杰 著 徐畅 译 董建中 译校

对中国和日本“17世纪危机”的几点观察 / 228

[美] 艾维四 著 陈兆肆 译 董建中 译校

东亚存在着17世纪“普遍性危机”吗？ / 259

[美] 艾维四 著 赵阳 译 董建中 译校

确有关联还是事后之明？ / 282

——东亚视野下的17世纪危机

[美] 迈克尔·马默 著 董建中 译

17世纪危机与欧亚史的统一 / 296

[丹麦] 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 著 杜涛 译 董建中 译校

危机与灾难：17世纪全球危机的再思考 / 311

[美] 杰弗里·帕克 著 董建中 译

前言

□ 董建中

历史是时间之箭，“历时性”是历史现象的根本特征。但地球上诸多国家、地区之间，历史现象是否存在“共时性”的问题，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本专辑中傅礼初《整体史：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1985）一文，是作者对于包括17世纪在内的早期近代世界进行的一次“环球旅行”，他“发现”了许多共时性现象。

人们对于17世纪共时性现象更多地归结为“危机”，表现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等。

对于17世纪危机表现的认识很早就已存在，但作为历史学命题的“17世纪危机”，是霍布斯鲍姆于1954年在创刊不久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17世纪危机》中正式提出的。相关文章在1965年以《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为题结集出版，当时对于危机的讨论还是着眼于欧洲。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类似的危机现象，1978年出版了《17世纪普遍性危机》一书。对于17世纪危机的讨论经久不衰，2008年《美国历史评论》第113卷第4期还设有“17世纪危机专栏”。

本专辑“中国与17世纪危机”，选译的是与中国研究（但不限于中国）有关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四组。

1973年，阿谢德率先将17世纪危机的研究引入中国研究，他发表了《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一文。魏斐德的《中国与17世纪危机》（1985）探讨了中国17世纪危机表现及走出危机。这是第一组。

明朝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日益加深，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态势以及对于明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及清初经济的影响，是第二组文章关涉的问题。其中有论点上的不同：如17世纪3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初白银的流入是减少还是增加了，这一时期白银内流的变动是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还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造成康熙萧条的原因是什么。这组文章包括艾维四的《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1982）和《1635—1644年前后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2005），岸本美绪的《康熙萧条与清代前期的地方市场》（1984），万志英的《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1996）。

突破了欧洲界域的17世纪危机研究，事实上是比较史学问题。第三组包括四篇文章：艾维四的《对中国和日本“17世纪危机”的几点观察》（1986）和《东亚存在着17世纪“普遍性危机”吗？》（1990）是将中国与日本的17世纪危机进行比较以及整体考察；迈克尔·马默《确有关联还是事后之明？——东亚视野下的17世纪危机》（2008）从东亚视角看待整个17世纪危机；金世杰《17世纪的东方与西方：斯图亚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明代中国的政治危机》（1988）探讨了17世纪东西方大国政治危机背后的共同原因；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的《17世纪危机与欧亚史的统一》（1990）将东亚、东南亚、南亚与欧洲进行综合比较。这种比较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问题研究对于世界史学的一种推进。

本专辑收入的许多文章在探讨17世纪危机时，都提到了一个因素——气候。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这是17世纪普遍性危机的背后原因。第四组的一篇文章，即杰弗里·帕克的《危机与灾难：17世纪全球危机的再思考》（2008），对17世纪气候灾难与危机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最后，作者的关怀指向了我们当下21世纪的气候现实，17世纪的历史直接与现实联通。

对于17世纪危机的讨论，诚如前引《美国历史评论》“十七世纪研究专栏”的按语所言，包括了许多问题，如资本主义出现、近（现）代国家发展、起义和叛乱、人口增长、物价史、不平等发展；

而许多理论与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社会学、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历史人口学、近（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也运用其中。

有不少学者将 17 世纪危机及其后对于危机克服、走出危机看作中西历史发展的一个分叉点。对它的研究，特别是从不同视野看待 17 世纪的中国，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及以后的历史走向大有裨益，这是我们进行译介此专辑的初衷。翻译工作得到了文章作者艾维四、岸本美绪、万志英、金世杰、迈克尔·马默、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杰弗里·帕克等诸位教授的支持，在此谨致谢忱。这里更要感谢参加翻译工作的各位同仁。

最后就翻译作些说明。“early modern period”，通常是指欧洲历史阶段划分中的 16—18 世纪，被认为是介于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一个时期，当然，从时代划分上，属于近（现）代的早期。这一术语后被用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具体所指历史时段有时会发生变化），或进行比较研究。本专辑中此词译作“早期近代”（“近代早期”，没有强作统一），但在意义上完全等同于“早期现代”（这源于现阶段在翻译实践中将 modernity 译作“近代”还是“现代”的纠结）。此外，虽然征引文献的作者姓名及题名的中译尽可能统一，但难免疏漏。凡此种及翻译错讹之处，敬希读者察谅、批评。

整体史：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 (1500—1800)*

□ [美] 傅礼初 著

□ 董建中 译

早期近代

中国是否能包括在早期近代史 (early modern history) 之内，这一问题是以另一个更具普遍性和更能引起人们争论的问题为先决条件的：存在着一个早期近代史吗，还是只有各种历史记述 (histories)？

欧洲有早期近代史。16—18 世纪的中东、中亚和印度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晚明和清初的中国当然也有着历史，并且这种历史的连续性远远超过因改朝换代所造成的断裂。但是，以上诸多地区各自的历史，更不必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西半球，是否有共同之处？是否存在对于这些地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将它们全部联系在一起的相互联系 (interconnections)、连续性 (continuities) 以及普遍性的走向 (general trends)？如果没有，那么，“早期近代”一词在欧洲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早期近代”也就没有历史，只有各种历史记述而已。

* Joseph Fletcher,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 1985, pp.37-57.

这篇文章并非傅礼初先生为发表而作，但其中的思想是他学术的核心内容。他在去世前希望能修改此文并予以发表。——原注

相互联系与连续性

一开始，我必须引入两个术语，这将有助于探讨我们的问题。第一个是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我用来指两个及以上社会间交往的历史现象，例如，一种思想、制度和宗教的传播，或是不同社会间进行的达到了相当数量的贸易。第二个是横向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这是指在两个及以上、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流的社会中拥有同种经济、社会或是文化的历史现象。疾病在两个彼此完全隔绝的社会里爆发造成了人口减少，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例子。但是，要称得上是横向连续性，那么引发这两个社会人口减少的最终原因必须是同一个。如果一个是霍乱而另一个是鼠疫，那么它们就不构成一种横向连续性，而只是两个相似事件。

横向连续性与纵向连续性（vertical continuity）有别，后者是制度、模式等等，历经时代变迁依然存在，如中国历史上皇帝制度的长期延续。还应指出，两个社会间发现有一种相互联系现象，并不必然意味着出现了横向连续性，反之亦然。现在回到我们的历史问题上。

没有人会否认，在通讯快捷、政治多极分化的20世纪70年代，越南、罗得西亚或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中国、苏联、西欧以及美国人的生活。同样的，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科技时代（Technological Age）与全球不同地方的历史命运交织在一起，世界已融为一体，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触及欧洲、美国和后来日本商业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多种社会主义的思潮。然而早期近代——16—18世纪是怎样的情形？是否有普遍性的历史（general history）？

早期近代的世界对历史学家来说不易整合，主要是因为已有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关于那些非西方世界的著作，重点研究政治和外交史，近来研究更多的是制度史。1500—1800年这一时段，当时世界上的政权和社会极为隔绝，少有长久的联系，更不必说相互深入的交往，除了一些欧洲国家，先是葡萄牙，然后是其他一些国家的沿海贸易。这一贸易对于相关的国家具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但在那段

时期，它对于欧洲船只频繁停泊的非洲和亚洲社会来讲鲜有影响。当然，美洲是另外一种情形，欧洲对它的冲击产生了直接和根本性的影响。正因如此，16—18 世纪的政治和外交史对于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体进行考察，帮助不大。同样，制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所起作用有限，因为它强调的是社会组织模式的特点，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间的文化独特性和非连续性，而不是跨社会的连续性，简言之，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

要找出早期近代史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我们必须透过政治和制度史的表面向下看，考察早期近代世界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在 17 世纪，例如，日本、中国西藏地区、伊朗、小亚细亚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所有这些地区看起来彼此隔绝，却正在对于某些相同、互相联系的，或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的甚至是社会的力量，作出反应。

整体史 (Integrative History)

整体史是对这种相互联系历史现象的探寻、描述和解释。从概念上讲，它的方法很简单——尽管付诸实施不易，首先是探寻历史上的平行性 (parallelism，世界不同国家同时发生的大致上相同的事情)^①，接下来是探究它们在成因上是否相互关联。这是最基本的研究。除非我们认识到了一些人类社会的共同点，包括发展历程中的 (历史学家的著作) 以及静态的 (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否则历史领域就没有框架可言。事实上，近代以前，没有历史，只有历史记述。不论构成历史“学科”的专门性研究的“马赛克” (mosaic) 多么漂亮，离开了宏观历史 (macrohistory) ——一种对于

① 对于这一术语的使用，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3, English tr.by Michael Bullock)，尤其是第一章《轴心时代》，1—21 页；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22—27 页。

连续性，或至少是历史中的平行性的初步的总体性研究模式，一个社会的历史特殊性的全部意义也就无法看到。换言之，要看到微观历史（microhistory）的“马赛克”所组成的图像，一个人就必须站远了来看。

在西欧和美国，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初步的总体性的研究模式，即宏观历史的史学思想的种类，与微观史学——在其指导下产生了构成上述马赛克的著作与文章——的种类相比，其落后程度令人惊讶。汤因比的力作《历史研究》视历史为一些社会类型的兴盛与衰落，但没有考虑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横向连续性。与之相反，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确实探讨了平行性，上溯到文明的开端，但是这些仅仅是保持着平行而已。也就是说，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了相似性（similarities），但他建立的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相互联系。最近，麦克内尔（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这是最好的世界史著作，尝试着将人类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使用的是“亚非欧文明世界”（*ecumene*[Afro-Eurasian civilized world]）的概念，认为它经历了三个“闭合期”（*closures*），分别是在公元前100—公元300年，1200—1400年以及最后的1500—1650年（开启了亚非欧和西半球的联系）。但是，正如书名所揭示的，麦克内尔主要关注的是西欧文明的兴起、扩张和统治，并且除描述了文化的传播外，他对于中世纪晚期或早期近代世界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中可能显示出横向连续性的共同趋势，既没有甄别也没有考察。

在共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这些是历史的真正所在）之上，仅有的系统尝试去推演世界历史的，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出的。其中大多数有着高度的意向性，他们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显示所有社会都遵循一种阶段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尤其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现他们自己要持有一些奇怪的认识，如“游牧封建主义”（*nomadic feudalism*）这样一些概念。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试图摆脱这种思想上的束缚，认为存在着例外^①，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生产方式”（Oriental mode of production）所表现的另类观点已被魏特夫（Wittfogel）、杜克义（Tökei）以及其他一些人相当充分地予以论述。^②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历史领域，就像在欧洲和美国大多数大学中所教授的，在通史（或说是整体史）历史学家看来，充斥着微观的，甚至是狭隘的观念；美国大学引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approach）令情况更加糟糕，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在地理上的特定地区与社会学家交流，但和研究与此无关的社会其他历史学家鲜有联系。此种情形之下，历史学家对纵向连续性（传统的持续，等等）很敏感，但对于横向连续性却目无所见，历史学家已倾向于将跨地区研究交给了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而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并不总是最适合这种研究。^③在这种惨淡景象之中，令人欣喜的是有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机缘主义”（conjuncturalist）的历史学家们，像布罗代尔（Braudel）、肖努（P. and H. Chaunu）以及德尔米尼（Dermigny）等学者，他们的研究指向更少狭隘的史学的将来。

历史，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已被划分为许多地理区域，每个区域的研究者很明显感到和其他地区的研究者几乎无话可谈。历史学家讨论方法论问题，学生们也被要求接触历史学和一点社会科学，

① 特别是图里别科夫《17—19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制度》（S. E. Tolybekov, *Obshchestvenno-ekonomicheskii stroi kazakhov v XVII-XIX vekakh*, Alma-Ata, Kazakhskoe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1959）以及《17至20世纪初的哈萨克游牧社会——政治经济分析》（*Kochevoe obshchestvo kazakhov v XVII-nachale XX veka: Politiko-ekonomicheskii analiz*, Alma-Ata, Nauka KazSSR, 1971）。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游牧社会是一个例外。

②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当然是众所周知的。杜克义《亚细亚生产方式》（*Tokei Ferenc, Az azsiai termelesi mod*, Budapest, 1965）；吉姆等编《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异同：有关东方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资料》（G. F. Kim, eds., *Obshchee i osobennoe v istoricheskom razvitii stran Vostoka: Materialy diskussii ob obshchestvennykh formatsiakh na Vostoka[Aziatskii sposob proizvodstva]*, Moscow, Nauka, 1966）。20世纪6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也重新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③ 普林斯顿大学的饶济凡（Gilbert F. Rozman）对于早期近代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关于18世纪中国、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著作从资料上帮助我们理解本文中所讨论的主题。

但是历史学家们——身为历史学家，常常缺少交流有用想法的共同基础。他们能够并乐于进行联系从中获益的仅有的基础，是由非历史学家所提供的理论。各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剪裁过的史料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要求，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因为当前的历史研究而能够并经常重新审视理论，比如说韦伯的理论。人们很容易想见研究中国清史的历史学家与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谈论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的思想——应该要求每个学习中国明清史的学生阅读伊兹科维兹（Norman Itzkowitz）所著简明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传统》（*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世界文明研究丛书，纽约：诺普出版社1972年版）。^①历史学家确实作了跨区域的研究，为此，他们通常需要历史之外的帮助，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甚至是在没有社会科学家参与的比较史的研究中，与其说是历史的（时间上的动态变化），不如说是社会科学的（集体行为的模式）。

如果想得到一个对于历史总貌的足够全面的看法——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楚马赛克图像中每一片的意义——那么仅有社会科学理论和比较史研究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研究整体史，揭示那些表面之下的、各社会共有的趋势和发展。因为离开了整体史，19世纪中期以前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历史，只有分隔地区的历史记述。

全球历史的起点

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整体史成为可能的时间范围怎样划定，正是在这一范围内早期近代才呈现出意义。从19世纪中叶开始，如上面所指出的，全球各地区历史记述中相互联系的特点基本得到公认，当然，将来的历史学家不费力气就可以找到当今世界的横向连

^① 该书的中译本见《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韦德培译，姚楠、龙协涛、刘锋校，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译者注